

核心阅读

不论是建党初期的反对英法等国际联盟、抗战时期的反对德意日等世界法西斯联盟，还是之后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不同历史时期世界的主要矛盾精准把脉，并将自身对时局的判断形成理论，向世界各国积极推广介绍，提出以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不仅立足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而且胸怀世界，不断为鼓舞和团结世界被压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等管用见效的中国方案。

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

1925年，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中国第一次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世界只存在相互斗争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存在中间势力。

他指出：“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可见，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坚信世界上的任何民族与国家，要么属于第三国际领导下的革命势力，要么属于国际联盟领导下的反革命势力。同时，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受英、法等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操纵的国际联盟旗帜下的反革命派，革命派面临着与其抵抗斗争的必然命运。这样的世界理念，为日后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也是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阶段。

倡导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日本侵华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后，原来世界反革命阵营中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开始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法西斯势力与反法西斯势力的较量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各国、民族中的反法西斯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

一方面，他立足中国国情，提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毛泽东倡导建立东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他指出，“这一时期内，革命的总任务，是把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组织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内，用以抵抗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与各国内部法西斯的袭击。”基于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延安组织“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通过《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宣言》。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国家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建立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不

久，在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1942年1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宣言》，表示共同抵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决不单独与其议和。该宣言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团结了世界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孤立了法西斯侵略势力，对于最后战胜法西斯国家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言以蔽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直接推动者，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引领作用。

“中间地带”理论的道路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逐渐陷入美苏两极争霸的冷战格局，分化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挫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与包围，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国际立场。随着美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国际社会出现“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许多悲观声音。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1946年，他结合当时世界形势，首次提出旨在反

对美帝国主义的“中间地带”理论，并断定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毛泽东认为，在当时世界上，美国 and 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20世纪60年代，他又对“中间地带”理论进行了完善，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为了抗衡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国，可以建立起包含苏联和广大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尽管“中间地带”理论具有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阵营立场倾向，但基于此理论形成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各国理性认识世界、争取世界和平提供了理论参考和道路选择。

提高我国国际威望的“三个世界”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时奉行霸权主义的苏联领导人开始对包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发出威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对世界局势的认识产生了新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理论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世界两极格局的阵营趋于瓦解，除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是世界格局不可或缺的第三大部分。二是造成当时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发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也引起部分第二世界国家的不满。三是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主力军。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首先紧密团结起来，组成反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

“三个世界”理论对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起了巨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并高度评价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为它“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三个世界”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由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思想派生发展而来，可以称之为“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

中央苏区时期国家治理的实践探索

朱一华

1931年11月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结束。随着中央苏区的开创、巩固和扩展，中国共产党立足8.4万平方公里红色土地，面向450万苏区人民，在国家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实践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

坚持党的领导，稳固中央苏区国家治理的政治基石。中央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完备的组织系统是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的政治前提。地方上，从中共苏区中央局到省委、特区委、分委；军队里，从军到师、团、营设党委，连设支部。党的领导从上而下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有力保障了中央苏区国家治理事业在各级各地有序推进。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时期国家治理取得了突破性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对内，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展了广泛而深刻的土地革命、强化了军事建设、改善了民生、完善了法制体系；对外，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多次“围剿”、扩大了对外贸易、增强了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坚持党的领导，离不开党的建设。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最大亮点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党原则，为国家治理筑牢了政治根基，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为强化党内思想统一，中央苏区不仅出版发行一大批革命书籍，还在苏维埃大学和红军大学开设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通过领导讲课、集中学习、知识竞赛、组织宣传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方式，迅速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极大增强了党领导的政治定力，有力推进了中央苏区国家治理的蓬勃发展。

维护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中央苏区国家治理的强大动力。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开创出群众安居乐业、军民鱼水相亲的崭新局面，关键得益于党在社会治理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1934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号召，将国家治理的焦点聚集在“群众”这一主体。由此，“为群众谋利益”的民生理念，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准则，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宗旨的实践源泉。民生理念的探索和民生实践的深化，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彰显了人民群众在中央苏区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广大民众投身国家治理的强大力量。

中央苏区的国家治理，着眼现实，瞄准群众痛点，千方百计地为人民群众解难题、谋利益。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加强了对劳动互助社的管理，保障了红军家属和孤寡老人的劳动力配给。《消费合作社标准章程》的颁布，促进了各类消费合作社的普遍建立，在敌人封锁、物资匮乏之严峻考验下，保障了苏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截止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共建立1100多个消费合作社，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的生活。除此之外，苏维埃政府还切实解决了群众面临的衣物、

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

薛永毅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疫情侵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疫情防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宣传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并对新中国疫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组织严密、统一领导”是核心

边区的防疫机构萌芽于1940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后，于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机关，其33人的组织构成，已涵盖到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以及边青救、抗大等党政军机关和相关群众团体，其地位之重要足见一斑。而1942年4月2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其职能范围则已经从原先的延安市扩大到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隶属于边区政府。指导扶助边区各机关、各级卫生机关执行防疫事务，并在执行防疫事务时，有权统一支配各级卫生机关之人力财力，包括人员、药品、器材等。1944年春，延安地区一度流行伤寒、回归热，市区附近死亡了240多人。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紧急决定：迅速成立流动治疗队，划定区域进行治疗；各机关、学校等进行紧急防疫动员，组织疫病区隔离；同时，增设病床、拨款购置药品、研制特效药方、落实医护人员表彰奖励等，有效控制了此次疫情的扩散蔓延。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是方针

防疫最积极的办法，莫过于改善环境卫生。毛泽东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综观边区疫情治理的实践，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疫情治理始终。1940年，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发

起“防疫运动突击周”。各机关、学校、部队等纷纷完善厨房、厕所防疫措施，增设污水坑、垃圾坑；个人则实行分食制，商店摊贩人员积极接种。防疫运动期内，还创立了4个模范农村，49个模范乡村和1个模范行政村。此外，在边区开展的乡村建设中，卫生防疫也是重要内容。1944年起，延安市开展“十一运动”，要求“每区有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随着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广泛开展，普及了卫生防疫基本常识，使得“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从而有效减少了边区疫情的发生。

坚持中西医结合，发挥各自优势。1940年6月，边区成立了第一个中医团体——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又相继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等。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将中西医防疫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取用边区土产中药材，试制出多种新型药品；打破“家传秘方死人不授人”的封建传统，献出秘方供同行学习研究；经常举行中西医座谈会，交流切磋，取长补短；组织医疗队下乡，调查流行病及疑难症，帮助群众诊治顽疾。凡此种种，推动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借鉴，发挥了传统中医药在卫生防疫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工作的民族特色。

“宣传教育、增强意识”是先导

借助报刊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是重要途径。早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就推出了“防疫”专栏，提出了“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防止苍蝇发生传播病毒”等八条具体的防疫措施。此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多次刊发“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重视防疫”“夏季防疫工作”等社论、时评及其他预防疾病的科普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起，先后刊出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

对边区的普通群众来说，看报读报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卫生宣传部门将卫生防疫宣传教育和农村庙

会以秧歌、戏剧等文艺表演结合起来，因其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边区举办的医疗卫生展览会。卫生展览会以实物、文字、图片、连环画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封建迷信危害，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给观展群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强大的心灵感召。如1944年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展出实物659件，图画260张，还有许多照片和连环画，一些群众连看四五次尚不满足。展览会历时8天，参观人数达万余人。

树立典型，带动全局。回顾边区的卫生防疫之宣传教育，其做法往往是自上而下，层层树立典型。通过树典型，总结群众创造出的卫生防疫先进经验，让群众看到别人家讲究卫生带来的好处，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自觉仿效卫生模范家庭培养卫生好习惯，进而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疫情发生。

“面向群众、群防群治”是主体

防疫工作，要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1937年初，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卫生运动周”时就明确表示：“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疫情的群防群治，陕甘宁边区走出了一条疫情治理的群众路线。

自发制定卫生防疫公约。边区各地从机关到农村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防疫计划或卫生公约。比如，城壕村在村民大会上选出了由劳动英雄张振财等5人组成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包括在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隔10天或半月全村开展一次大扫除、病牛病羊要马上分开等在内的详细的卫生防疫计划。而针对个别群众没眼看病买药的困境，该村又通过设立医药救助金及互助金等方式予以解决。城壕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卫生模范村。

探索卫生合作互助新模式。1944年，陕甘宁边区大众卫生合作社的创办，就是着眼于疫情治理中医务力量有限、民众希望方便就医的实际需求，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依靠群众又服务群众的探索创新。在

边区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时隔两年，这一民办公助的合作医疗机构已经初具规模，成为边区三大医疗系统外的有益补充。卫生合作社成立以来，更是在卫生防疫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内向卫生合作社的社员按股分红，使其享有特别诊疗之权。对外普及卫生防疫知识，为群众种牛痘、预防注射，收集研究民间药方，参与传染病的治疗，等等。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工出工，有药出药，大家动手，卫生合作”。

“完善制度、健全法令”是保障

为推动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到一切都有章可循，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命令、指示和通知，并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一套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控机制。包括：事发前的接种预防制度、预警制度，事发时的疫情报告制度以及隔离制度等。如1942年5月13日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就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是第一类传染病。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话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伤寒及副伤寒、赤痢、回归热等是第二类传染病，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该条例还进一步规定：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委员会确实诊断之后，得及时限期断绝发病区域之交通，施行病人隔离等，病人应即送医院；无医院设备处，必要时得由防疫总会协同地方设立隔离病院。再如，1948年2月7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切实组织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防疫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隔离收治等规定。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了完善了儿童防疫等方面专门的防疫制度，防疫工作逐渐走上有章可循的轨道。

事实证明，切实管用的防疫机制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6年1月发生的延安市脑膜炎疫情，正是因为迅速治疗、及时隔离，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住院的病人除1人因病重死亡外，其余均痊愈，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早救治。

